

第一章

国父孙中山

南海之滨降生的巨星

时代呼唤英雄，人民需要救星。当清朝末年皇帝腐朽无能，香港被割让，圆明园被烧毁，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签订的时候，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伟人——孙中山，诞生了。

香山，广州南面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城。

翠亨村，香山县一个最穷的小村庄。

当 1866 年 11 月 12 日的历史时针转到翠亨村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了。婴儿的父亲叫孙达成，妻子杨氏，望着这个婴儿，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给孩子起个名字。”孙达成轻轻地对着妻子说。

妻子杨氏抹了一下脸上的汗珠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极殿里的北帝菩萨来到我面前，我给吓醒了。抬头看见墙上的画，画中那个骑着象的菩萨，就像我梦里见的北帝菩萨，不知道这是福还是祸？”

“那就给孩子起名叫‘帝象’吧，以求菩萨能保佑他。”

帝象出生时排行老五；大哥阿眉年长 12 岁，后来对他影响至大；二姐与三哥在他出世前就夭亡了；四姐妙茜，长他 3 岁，一直活到 1955 年。

光阴荏苒，不觉六年过去了，其间家与国家都发生了许多事情，小帝象最熟悉的无非是身边的家事：最疼爱他的老祖母过世了，带他玩的大哥跟随舅舅到海外打工，妈妈又生了一个小妹妹。

在翠亨村有位名叫冯爽观的农民，曾经是太平军战士。他在闲暇时，常坐在村中的大树下，向孩子们讲述当年太平天国的故事。每逢讲故事时，帝象便是他的忠实的热心听众。

帝象从这时也就开始了接触天下的大事了。

帝象 10 岁时，父亲便将他带到冯氏祠堂里的村塾拜见塾师王先生。因上学，不能再叫小名，于是便给帝象正式起了个名，叫“孙文”。从此，帝象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孙文。

光绪四年（1878 年）离别故乡 7 年的孙眉回来了。他如今已经成为一个富有的华侨资本家，这次回国是来结婚的。

留洋几年的孙眉带回了许多海外的新鲜事情，孙文这才知道，在大清皇帝的“天下”之外，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孙文想去这个世界看看，但孙眉说：“你还太小，需要读书，等过几年，长大了，有知识了，我一定带你到海外去做事。”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回来招工，在澳门雇用英国 2000 吨的大海船，即将启航。孙文再也按捺不住了，死缠硬磨地要出去长长见识。

孙文的父亲孙达成，见孙文执意要去，也就同意了：让他出去闯闯也好，老伴也正想去看看阿眉。

1879 年 5 月，孙中山终于和母亲一同登上一艘英国轮船，离开了自己生活多年的故乡，走向广阔的世界。

孙文首先到达澳门。

澳门在翠亨村南方，相距约 70 公里，自 16 世纪被葡萄牙占

领以来，经过几百年异国情调的熏染，早与内地大异其趣：赌室和鸦片馆比比皆是，大街上浓妆艳抹、面无表情的妓女游来荡去，内河的花船中不时飘来丝竹声与男女调笑声……这种一本正经的无聊、骨子里藏着空虚的奢华，对孙文这个朴实的农家子弟来说，是多么不相宜啊。

大海船从澳门起航，经过 25 个日夜的航行，来到了檀香山。

檀香山是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群岛上的一个海港，那时候还是美国的一个殖民地。夏威夷美丽而富饶，素有太平洋乐园之称。岛上风光旖旎，气候宜人，许多华侨都把它描绘成人间的世外桃源。孙眉到檀香山几年时间，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打工者，一变而成为一位拥有一千英亩的牧场、数以万计的马、牛、猪、鸡和一些伐木场、酿酒厂、杂货商店的殷实的华侨资本家，他还租下了整个茂宜岛，被人称为“茂宜王”。

孙文在檀香山，最初是帮哥哥照应店铺学习记账。时间不长，便进入夏威夷的意奥兰尼学校学习。

意奥兰尼学校是一所基督教圣公会所办的教会中学，条件很好。孙文在这所学校里接受的是纯粹西方式的教育。

在和孙文一起就读的 10 多名中国同学，每人身后都有一条长辫子，由此而经常招来外国同学的耻笑。

有一天有位同学不解地问他：“你为何不把辫子剪去呢？”

孙文立即答道：“此种陋习，是满清强迫造成，须等全国国民联合一致，一举而革除，否则我一人剪去也是无益。”此时，他的头脑中已渗进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孙文毕业时获得了《英文法》二等奖，夏威夷国王加刺鸪在毕业典礼上亲自颁奖。

1883 年春天，孙文进入檀香山最高学府美制奥阿厚书院读中学。在书院，孙文除了上课之外，还参加了基督教活动，并逐渐对基督教产生了信仰，甚至想皈依基督教。

孙文想皈依基督教遭到了哥哥的坚决反对，以致为此事，哥俩大闹一场后不欢而别。已 18 岁的孙文独自一人回国。

回到家乡的孙文，时常将他在海外所见所闻讲给一些志趣相投的年轻人听。在这些年轻人中，有一个名叫陈皓东，同孙文关系最为密切。陆皓东从小长在上海，头脑灵，见识广，他和孙中山一样，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不满，希望能改变这个不平的世道。

一天，他们发现村中正在修北极殿，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工，这不该有的摊派，使得孙文来了气：

“北极殿里的那个泥菩萨，年年要修，劳民伤财！我们把它给砸了。”

“好！”陆皓东支持孙文的想法。

他俩认真仔细地商量后，便开始了他们第一次“革命”行动，砸毁了泥菩萨。

这冲破世俗的举动，轰动了整个村子，害怕神会惩罚全村的百姓们，纷纷向孙达成兴师问罪。孙中山在翠亨村呆不下去了，便于第二天清早，悄悄离开翠亨村，去香港求学。

香港在翠亨东南，相距不远，自 1842 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后，教育逐渐发达。孙文先进拔翠书院，后转中央书院，读书费用由大哥支付，但他没有遵从大哥的意愿，当年底就在牧师的引导下受洗入教，改名“日新”，取义于《大学·盘铭》中名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后，国文家庭老师按其粤音改号为“逸仙”。

中央书院非一般学校，建于 1862 年，采用英国教育制度，是香港第一所官立中学，中国近代许多成名人物曾在此就读过。孙文来此如鱼得水，受益匪浅，特别是西方历史课程给他很大启发。当时正逢中法战争爆发，香港人民的爱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他，他也非常关注战争的进展。

孙眉在檀香山听说弟弟的情况后，很为弟弟担心，为使弟弟“改邪归正”，孙眉给孙文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自己生意受挫，急需用钱，但原来的财产有一半划在孙文的名下，自己不能动用，

希望孙文速来檀香山，助他一臂之力。

孙文接到哥哥信后，立刻办了退学手续，再次登上赴檀香山的轮船。

当孙文到达檀香山，见到哥哥孙眉后，竟招致一顿大骂：“你怎能闯下这样的大祸！不要你信基督教，你偏要信，砸烂神像！现在还居然加入了基督教！”

由于孙眉强迫孙文退出基督教，而孙文又执意不肯，由此哥俩再次闹僵。最后，孙文离开檀香山，返回香港，继续到中央书院学习。

1884年到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了。孙文和他的香港同学都很关心这场战争。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老将冯子材率各路人马大败法军，取得了谅山大捷，导致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捷报传来，人心大振，可腐朽昏庸的清政府不但没能乘胜追击，把法国侵略者赶出去，反而借口所谓“乘胜就收”，同法国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条约，中国从战胜国变成了战败国。战争的结局深深刺痛了孙中山的心，他后来曾经说过，正是从中法战争，他才开始“有志于革命”。

从中央书院毕业后，应该选择什么职业呢？他想起了他在檀香山时读过的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一句名言：“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他认为，如今已是20岁的人了，正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中、西文化的教育注定他不甘做平庸的人。他立志要造大清的反，但他深知，造反的准备工作需要有一种职业来掩护，行医无疑是这种相宜的职业，东汉末年的张角不就是依靠治病救人发起了轰轰烈烈的黄巾起义吗？于是，他决定做个医生，用自己的医术来救济世人。1886年夏天，他进入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

一年后，他又转学香港雅丽氏医院附设的西医书院，开始用名“孙逸仙”。

孙逸仙勤思好学，博览群书，成绩出类拔萃。教务长英国人

康德黎非常器重，但对他关心政治不以为然。同学关景良的母亲黎老师也是如此，她经常叫孙逸仙到家中吃饭，一次饭后问他：“你志向高远，将来准备做什么官？”“我不想做官。”“那你想当皇帝吗？”“更不想。”“但我想推翻满洲政府，还我汉族山河，那事业比皇帝更高更大！”

孙逸仙在学习期间，有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如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等。他们都不满现状，希望改良社会，经常在一起大胆地议论时政，批评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一些胆小的人给他们封一个号：“四大寇”。

五年时间匆匆而过，孙逸仙因成绩优异而提前一年毕业。3月13日毕业典礼时，香港总督、首席法官都到场了。

在毕业典礼上，孙逸仙接受由总督罗便臣颁发的奖品：三本由外国人著述的医书。接着由康德黎报告西医书院的创建经过与现状，讲完后颁给孙逸仙与江华良二人成绩优秀的毕业执照。

毕业执照上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中文是：
香港西医书院掌院并讲考各员等，为给执照事：

照得孙逸仙在本院肄业五年，医学各门历经考验，于内、外、妇、婴诸科，但毕皆通晓，确堪行事，奉医学局，掌给香港西医书院考准权宜行医字样。为此发给此照，以昭信守。须至执照者。右仰该生收执

1892年7月23日

孙逸仙抑制不住激动，五年大学生活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自由而充实，同学相长，师生情深，如今一旦离开，眷恋之情油然而生，热泪在眼眶中打转。

孙逸仙毕业后在北京谋职，没有成功，准备开药局，就找陈少白商量，叫他起草章程。母校校长知道了，找他谈话：“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开药局，因为你是本校第一届第一名学生，应该自爱。”按英国习惯，医生是上等人，是不屑做买卖这种比较低贱之事的。困惑之际，澳门镜湖医院院长聘请

他当主治医生。

孙逸仙走马上任，兢兢业业，并向医院借款开办了中西药局。他以治病救人第一，收费低廉，对贫寒者，则往往免费治疗，遇疑难病症，康德黎老师常从香港赶来指教。不数月，声名鹊起，门庭若市。

孙逸仙的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在澳门越传越广，引起了澳门的葡萄牙医生的嫉妒。他们借口孙逸仙没有葡萄牙政府发的行医执照，阻止他在澳门行医，孙逸仙无奈只好离开澳门，来到广州。不久，在广州西关基开了一家东西药局，继续行医。

有一天，孙逸仙看见一批衣衫褴褛的犯人要被处决。此时清政府的一个提督带着家人来看病。

孙逸仙便问道：“这些人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大喊冤枉？”

“这些人再杀几个也不多？”

孙逸仙得知这些将被处决的人，连审问都没有。非常气愤。他是一名医生，责任是治病救人，眼看这些人就要被杀死，但却救不了他们。医生只能治人的病，却不能治国家的病，国家如果没有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那就还会有很多无辜的人被屠杀，医生再有本领又有什么用！想到这些，孙逸仙感到，要救人先要救国，不能放弃救国的责任。

1894年，孙逸仙离开广州，回到翠亨村家中。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奋笔疾书，要上书李鸿章，提出兴利除弊、改良政治的方法。这是他的最后一试，如果能够通过改良的方法，不流血地达到救国的目的，那当然是上策了。

但孙逸仙失望了。这年夏，他和陆皓东一同北上，上书李鸿章，竟被置之不理。恰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在这场战争中被打得一败涂地，再一次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改良的道路走不通，孙中山对清政府彻底绝望，从此，他走上了以武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撑起救国救民的大旗

孙逸仙决定弃医从政，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救国救民的大业。他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在日本建立同盟会，多次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他撑起的救国救民的大旗，直指腐败无能的满清王朝。

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刚刚兴起的，只有弹丸之地的东瀛岛国日本，竟然打败了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堂堂中国。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了条件苛刻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国不仅要付出巨额赔款，还要割让大片领土，……这一切深深刺痛了孙逸仙。他下定决心，放弃行医，做一个职业革命家，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救国救民的大业。

这年 10 月，孙逸仙再赴檀香山，在华侨中进行救国的宣传。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也激起了许多华侨的爱国义愤，大家都赞同成立一个救国的革命组织。

11 月 24 日，他们在银行职员何宽住处召开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参加兴中会的，除了孙逸仙和何宽以外，还有邓荫南、李昌等二十多人。

孙逸仙待大家到齐后，站起来说：“今天我们在此秘密集会，就是要成立一个坚定的组织，这个组织定名为兴中会，以振兴中华、挽救危亡为己任！”接着孙逸仙宣读《兴中会成立宣言》：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蕃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列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因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

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夏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尊我中夏。

语言优美铿锵，荡气回肠。接着开始选举，选举结束后，孙逸仙严肃地说：“反清事业须立志牺牲，非寻常会社署名附和可比。须尊重宣誓，失信失忠，有始有卒，方克济事。所以今天入会者要一律宣誓。”

孙逸仙第一个宣誓：左手按住桌上打开《圣经》，右手高举，朗诵道：“联盟人香山县孙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会后，夏威夷的兴中会会员很快发展到一百三十多人，孙逸仙的哥哥孙眉也加入了兴中会。

1895年1月，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

孙逸仙回到香港后，立即召集陆皓东，陈少白、郑士良、杨鹤龄等从前好友商量扩大兴中会。尤列提议说：“香港有16兄弟组织的‘辅仁文社’，为首的叫杨衢云，不如叫来一并入伙。”孙逸仙听后，点头应允，并立即派人联络。杨衢云乃福建海澄人氏，因做工轧断三根手指，人称“杨七指”，此人行侠仗义，有大志，周围集聚黄咏商、谢赞泰等一班爱国青年。他见过孙逸仙的来使，立即召集弟兄们商量。大家决议取消“辅仁文社”，共创“香港兴中会”。

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孙逸仙被推为总会长，又叫伯里士登德，英文为 President，即起义成功后，为大总统。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大家便分头准备，同时决定于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举行广州起义。

可是，起义领导人之一朱淇在家中起草起义用的《讨满英文》时，被他哥哥朱湘发现，朱湘怕连累自己，便向官府告发，以致清兵有了准备，待起义战士抵达广州时，就被守候的清兵截住。陆皓东得知消息后，冒着生命危险销毁文件，不幸被捕遭到

杀害。

孙逸仙闻此噩耗，十分悲痛，他高度称赞陆皓东是“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之第一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一千两银子通缉孙中山。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和陈少白等人不得不离开中国，东渡日本。

1895年11月10日，孙逸仙抵达神户。第二天，他见当地报纸有一则消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

“革命党，”孙逸仙在细细地品味，“好，这个称呼好，我们就是革命党。‘革命’二字出自《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我们的革命正是顺乎天而应乎人。”

从此以后，孙逸仙他们就以革命党自称，并断发改装，剪去辫子，改穿西装，表示和满清政府决裂，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孙逸仙从此开始为革命奔波。他于1896年6月到达美国，在美国华侨中宣传革命。

1896年9月，孙逸仙抵达英国利物浦。由于受到清使馆密探监视，便于10月1日抵达伦敦。

在伦敦，他被一个同乡出卖，被拘禁在清政府公使馆。

康德黎得知孙逸仙被软禁后，非常焦急，想尽办法来解救孙逸仙。

在康德黎得知孙逸仙被软禁的第二天，他奉英国外交部的命令，就孙逸仙被清使馆诱捕一事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英国政府决定进行干涉。当天下午，伦敦《地球报》记者采访康德黎了解详情，随即以《革命家被诱捕于伦敦》为题发表。文章刊出后，舆论大哗，康德黎家中来访者门槛为穿。次日早晨，伦敦各家报纸都刊登了关于绑架的新闻，有些报纸还转载了《地球报》第一次的报道。无论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组织，都对清使馆的行为一致表示愤慨，要求立即释放孙逸仙。迫于舆论的压力，公使馆答应释放孙逸仙。4点半时，康德黎、杰维斯陪同外交部代表来到中国公使馆领出了孙逸仙。

孙逸仙在释放后的第二天致函伦敦各报主笔：“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充溢于英国的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所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孙逸仙被拘禁之事，英国、美国和其他各国的报纸继续就这件事发表报道和评论，孙逸仙也因伦敦蒙难而成为世界著名的革命家。

孙逸仙脱险后，在伦敦又活动了大半年，结识了不少的朋友，阅读了不少书籍。他开始察觉到英国社会也不尽人意，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非常尖锐，社会革命势将难免，由此他萌发中国革命应该将社会问题一并解决的想法。

8月中旬，孙逸仙再次来到日本，住在陈少白那里。在日本，他结识了两个日本朋友，一个是宫崎寅藏，还有一个是平山周，经他俩介绍，又结论了犬养毅、兴山满、萱野长知、山田良政等日本朋友。在为孙中山登记住旅馆的时候，平山周给孙逸仙起了一个化名“中山樵”，谁知以后革命党人宣传时竟把这个名字加到其本姓之后改为“孙中山”，并且越传越响，盖过了其他称呼。

在 1898 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依靠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但改良遭到了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阻挠，并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

康有为狼狈地来到日本，但放不下架子，孙中山有意和他们联合，共同救国，但康有为不愿与革命党来往。

孙中山派平山居和陈少白拜访他 陈少白真诚地对康有为说：“我们都在日本流亡，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救国。”

康有为正襟危坐，摆出一副傲慢的架子：“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日。我奉皇上衣带诏，力谋起兵勤王，岂能与革命党同

流！”

康有为死心踏地甘愿充当清朝皇帝的奴才，孙中山只能放弃同他联合的打算。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达日本之初，就计划新的暴动。他认为广东地区民风强悍，地理上又便于获取外援，适于起事；但因1895年之事，官府心有余悸，防备甚严，一时不宜下手，只能局限于日本活动。大半年来，孙中山结识了不少人物，有志士，也有政客。令他耿耿于怀的是对维新派千方百计的争取几乎化为乌有，康有为冥顽不化，影响了一大批维新分子。梁启超等人虽然信誓旦旦，却摆脱不了康氏的阴影。这些事暂时只能放在一边，他需要注目国内。其时，中华大地上反洋教的义和团事件风起云涌，撼动着腐败的清政权，这正是揭竿的好时机。

孙中山抓住时机，准备在华南发动起义，他派郑士良到惠州发动起义，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划响应，他本人到台湾会见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争取日本的援助。

但惠州起义因种种原因失败了，在这次起义中，山田良政被清军捕获，成为为中国民主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个外国人。

被孙中山派往广州的史坚如被捕后，受尽酷刑后被杀害。

惠州起义的失败证明，把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于外国的援助是行不通的。

.....

1902年是不平常的一年，在国内不仅有直隶景廷宾领导的“扫清灭洋”起义，还有上海爆发学潮；在日本，孙中山通过广泛的接触，获得了留学界的认同与尊敬。年底，他应韬美之邀，再次乘法轮“烟迪斯”号前往西贡，开始了在南洋大半年的活动。孙中山在越南虽然没有得到法国殖民官员的支持，却认识了许多爱国华侨；促使他们建立许多革命团体，为以后发动华南起义开创了基础。

1904 年 12 月，孙中山应欧洲留学生的请求离美赴欧，他先到英国，随后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留法、留德学生贺之才、朱和中等人已在這裡集中，他们同孙中山在一起畅谈了三天。最后，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并当即起草誓词：

立誓人 ×××，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1905 年 7 月 19 日，孙中山抵达日本。孙中山到日本后，由宫崎寅藏介绍，会见了黄兴。

黄兴早就对孙中山十分敬仰，非常愿意同他合作。第二天，黄兴又和孙中山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见了宋教仁、陈天华等一批在留学生中很有威信的青年革命家。孙中山高瞻远瞩，向他们透彻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同时指出：“现在最要紧的，是应该把各地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组织，采取一致的行动，这样就有力量了。”

大家都同意孙中山的意见，这次会见加速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1905 年 7 月 30 日下午，在东京赤坂区黑龙会日本朋友内田良平家里举行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会议确定成立全国统一组织——中国同盟会。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纲领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黄兴在会上提议：“推举孙中山为本党总理。”获得了一致同意。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一方面继续开展革命宣传，揭露保皇派的真面目，同时，在欧美和南洋的华侨中积极募集经费，多次发动武装起义。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共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其中，从 1907 年 5 月到 1908 年 4 月的一年中就有六次。这六次武装起义分别是：1907 年 5 月的黄冈起义、1907 年 6 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 年 9 月的防城起义、1907 年 12 月的广西镇南关起义、

1908年3月的广西钦廉起义和1908年4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再加上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孙中山已经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虽然起义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有些革命者灰心了，但孙中山却毫不动摇，他相信只要坚持下去，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的。

孙中山领导的前八次武装起义，依靠的是会党、青年学生和一般平民。河口起义失败后，他开始把目光转向新军，许多同盟会员投身新军，直接在清政府的军队中建立同盟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历史证明，这是很有成效的办法。

创建民国让位北京

满清王朝在革命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武昌起义的硝烟散去，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临时政府成立，但老谋深算的袁世凯施诡计，孙中山迫于形势，让位北京。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形势真可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满清王朝在革命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状态。

1910年5月23日（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铁路协定，联合逼迫清政府向其借款修筑川汉、粤汉两铁路。次年，盛宣怀就任邮传部尚书后，向清廷提出把各省铁路收归国有、借款兴办的具体办法。5月8日清“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清政府宣布全国铁路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5月18日任命端方为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派其南下强行接收鄂、湘、川、粤四省绅商士民的商办铁路公司。5月20日即与四国银行团订立了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合同规定：

借款总额 600 百万英镑，年息 5 厘，以两湖厘金盐税作担保，粤汉路用英国总工程师，川汉路用美、德两国总工程师，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两路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改变了铁路准交商办的政策，夺路、夺款、借外债以挽救自身的覆亡。这种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和反对。尤其是川、粤、鄂、湘四省绅商士民，经过长期收回利权运动，争得川汉、粤汉两路商办的利权，集股筹款。铁路国有侵害了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因而保路风潮顷刻勃起于长江中游。

1911 年 5 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准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清政府一纸“劫收”诏令就夺去了商民的股权，这种赤裸裸的掠夺行为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义愤。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省迅速掀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运动。运动开始时是由立宪派领导的，采用开会宣传、进京请愿的方式，要求清政府收回成命，力图将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但清政府悍然拒绝并严禁保路运动。广大群众逐渐突破“文明争路”的束缚，长沙、株洲万余工人举行罢工示威，湖北宜昌数千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湖南学生罢课抗议清政府的卖国行径，留日学生与海外华侨也坚决主张和清政府抗争到底。四川的保路运动尤为激烈，各地纷纷成立保路同志会。8 月 24 日成都召开有万人参加的保路大会，号召罢市、罢课、抗粮抗捐。四川的革命党人和哥老会力图把保路风潮引向武装起义。9 月 17 日清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代表罗伦、蒲殿俊等，封闭铁路公司，愤怒的群众数万人齐集督署门前要求释放被捕人员，赵尔丰竟下令开枪打死群众几十人，造成流血惨案。消息传出，全省沸腾，各地纷纷组织保路同志军，发动武装斗争，旬日间就有十几万起义军进攻成都。保护运动的猛烈发展使清政府惊慌万状，急忙从湖北调新军入川镇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趁机发动武昌起义。

武汉是革命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尤其是湖北新军中一直有革命党人秘密活动，已经积蓄了一定的革命力量。在同盟会总会的促进下，活动于湖北新军中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开始合作，决定在武汉发动武装起义。9月14日组成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推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设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制定武装起义计划和各种文告，并派人赴沪请同盟会领导人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鄂主持大计。原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起义，因准备不及而推迟。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秘密机关装配炸弹，失慎爆炸，被俄警将准备的炸药、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物搜去，起义秘密暴露，清政府开始在武汉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因形势紧迫不容再拖，蒋翊武决定当晚发动，派人向新军各标营下达起义命令、规定夜12时以南湖炮声为号正式发动起义，命令发出不久，指挥部也遭到军警破坏，刘复基、彭楚藩等被捕，蒋翊武装迫逃出武昌。由于戒严，起义命令没有送达南湖炮营，号炮未响，各标营没有发动，当夜起义计划没有实现。次日凌晨，湖广总督瑞澂下令审讯被捕的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位革命党人。他们坚拒吐实，痛斥清廷，最后慷慨就义。三烈士惨遭杀害，使革命同志万分悲愤，斗志更坚。清吏按所获名册大肆搜捕，形势十分危急。各标营的革命党人自动秘密串联，准备当晚发动起义。是日晚八时许，驻武昌城内的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起义士兵在工程第八营革命党人总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打死反动军官，冲出营房，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武昌起义正式爆发。城内各营闻风而动，起义的队伍不约而同相继向楚望台集结。为扩大战果，夺取胜利，起义士兵推举曾参加过日知会的工程八营左队队长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主持对敌人首脑机关湖广总督衙门的进攻，南湖炮队也进城参战。经一夜激战，总督衙门和各重要目标均被攻克，清湖广总督瑞澂和第八镇统制张彪逃出城外。武昌全城光复，起义获得成功。

10月11日上午，革命党人和起义士兵聚集咨议局开会，商讨建立军政府问题。立宪派头面人物见大势所趋，立即附和革命。在议论都督人选时，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必须由革命者掌握政权的重要性，竟错误的以为应当推举一个德高望重的知名人物，以便号召天下，争取各省响应。立宪派也乘机进言，极力推举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于是起义者把当时尚躲在武昌城内的黎元洪找来，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又将咨议局局长汤化龙推为民政长。因黎元洪起初不肯顺从任职，装聋作哑，由革命党人蔡济民，吴醒汉、张廷辅等十五人组织谋略处，主持军政事务，决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废止宣统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用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并通电全国号召各省响应。为争取外国的中立和承认，照会各国驻汉口领事，宣布以前清朝与各国所订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各国在华既得利益和外人生命财产均予保护，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两日内，汉阳、汉口相继光复，广大群众对革命表现出极大热情，积极支持革命军打退清军的反扑，局面渐趋稳定。这时，黎元洪见革命成功有望，转变顽固态度，表示愿为“军政府之一人”；汤化龙则起草了《军政府暂行条例》，准备在革命阵营中窃取实权。由于革命党人缺乏政治经验，阶级阵线模糊，《条例》竟被通过并据此确定了军政府的组织机构。黎元洪兼任总司令，总揽军政府一切大权，下设参谋、军务、军令、政事四部，政事部下又分设内务、财政、外交、编制、文书、司法、交通七局，谋略处被取消了。在人事安排上，各部、局长多为原清军的军官和咨议局成员，革命党人却为数很少，湖北军政府的实权落于旧官僚和立宪派之手。

武昌起义的爆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全国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湖北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必然结果。武昌起义的成功打开了清朝反动统治的缺口，鼓舞和带动了全国的反清斗争，各地纷纷响应，迅速掀起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终于淹没了